

汪习波

著

隋唐文选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汪习波

著

隋唐文选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文选学研究 / 汪习波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25—4000—6

I. 隋... II. 汪... III. 文选 - 文学研究 - 中国 - 隋唐
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159 号

本书出版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隋唐文选学研究

汪习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25—4000—6

I·1770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骆玉明

自西晋挚虞编《文章流别集》迄南北朝之末,有许多文士热衷于编撰总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称凡“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几乎全都亡佚,若以汇集历代各类诗文为标准,由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实是硕果仅存的一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中被列于总集之首。说起那些总集的亡佚自然也是可惜的事情,但这与《文选》所具备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足以代表它们也大有关系。实际上,《文选》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反映萧统及其周围可能参与选事的文士们的文学趣味的一部书,自《史记》在人物传记中选录传主的文章名篇以来,对不断产生的数量庞大的“文章”(它包括各种类型的独立成篇的诗文)加以评判、汰选、传布、保存,是一项有各式人物参与的前后相续的文化事业,而《文选》则是这项事业在梁代的总结性成果。人们看到《文选》涉及的作者、文篇与《文心雕龙》论及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相重,首先会想到二书的编撰者、作者文学观的接近,但恐怕那时代的人们对名家名篇的确认彼此间并无很大出入,这里存在着在历史过程里达成的大致的共识与公论。那时代在文章的评判上各执所是、歧见相峙的情形实不似后世之严重。至于《玉台新咏》选诗与《文选》明显不同,其实更多地与二书性质相异有关。另一方面,《文选》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娱心悦目的文艺书,它代表了汉魏六朝文学的正宗与传统,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总汇,尤其是关于如何运用高雅的语言精致和恰当地表达人生情感与志趣的知识的总汇。《诗三百》曾经是

高雅语言的典范,夫子称:“不学《诗》,无以言。”而生活变得复杂、精神世界变得丰富了,语言必须与之相适应,新的范本是不可缺少的。看唐人命小儿诵《文选》的记录(如杜甫《宗武生日》诗嘱儿“熟精《文选》理”),应是首先有“无以言”的考虑吧。再往后,以一部书来承担复杂而多样的文化功能的情形遂不复存在,所以《文选》成为专学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上世纪前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现代,而《文选》学虽也不乏新创的成果,却始终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或以为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并列,使之遭到过分打击,细想来却未必是。大概较之当时文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新气象,“《选》学”因其本身的特点所限,很难带给人们创造的兴奋。至50年代以后,它终于衰落到了极点,据王立群先生《现代〈文选〉学史》统计,自建国初至1977年,内地《文选》学研究论文总共仅有6篇。但似乎是证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在这以后的20余年间,《文选》学终于又成为古代文史研究中颇见兴旺而成就突出的领域之一。这首先当然是得益于整个社会学术活力的复苏,同时也另有个别性的缘由:过去数十年间海外尤其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并未间断,他们的丰富成果被介绍引进后给内地学者带来一种刺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近些年来多种珍贵的前人所未见的《文选》版本相继被发现或由秘藏而转为印行流布,为《选》学的再兴提供了条件,因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贯注心血与才智于此。汪习波君于两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隋唐文选学研究》也是这一热潮中的产物。

《文选》学的成立和全盛阶段都是在隋唐。汪君此书以隋唐《文选》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在做一桩清理本源的工作。说来既然隋唐《文选》学如此重要,前人当然不可能轻忽视之,自60多年前骆鸿凯著《文选学》以来,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实已多有发明。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投入力量的不足,全面和深细的考察仍久付阙如。

汪君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研旧籍,又尽量利用各种晚近所出资料,如敦煌写卷、日本所存古抄本《文选集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陈八郎刊本五臣注《文选》,以及出土墓志之类,断文残卷,片言只字,凡涉紧要处,皆一一爬梳,比照钩稽,索其隐情,以求“对隋唐《文选》学作出较全面的论述”。此本难为之事,要说毕其功于一役自是不能,但这一尝试在《文选》学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本书作全面介绍不是这篇短序预定的任务,其研究成果应如何评价读者亦自有明断,但它的某些长处我想仍值得一说。这本论著很值得赞赏的一个特色是对文献源流的细致考索。古籍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据今之所见以论古,稍有不慎便生错谬。如《文选》最重要的李善注,人们每每凭借常见的南宋尤袤刻本和承此而来的清胡克家刻本论其是非得失,但由于李注的原貌本非尽然如此,其所论难免有落空的危险。此书专门论析了《文选》李善注的成书与文本变迁问题,对这方面的大致情况作出了可信的描述,尤其是证明了李注在写本时代就存在多种文本形态,后世刻本并非单纯依据某一文本成型,这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现存的李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重视文献源流这种学术素质是贯穿于全书的。还有,虽然此书的基本工作是考证史实和比勘文本,大量文字篇幅均用于此,很多地方不避琐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所关心的只是一系列个别存在的现象与问题;恰恰相反,“知识与思想世界”的情形,汉唐学术文化变化之大势,始终是这部《隋唐文选学研究》的总体视野。在这一大视野下,作者对许多具体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想必受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启发,而在向来的《文选》学研究中则是少见的,深入下去,会给这一学术领域带来新的变化。我读此书,每有不能满足的感觉,除了偏于技术性的问题外,更多是由于作者立意甚高而力量尚有未逮——然而立意甚高,岂非值得嘉许之事?

往年汪习波君读书期间,曾选修我所讲授的课程,课余闲谈,知道他对学术研究很有喜好。毕业后汪君在机关工作,总不免心存遗憾。如今他的博士论文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多少也是一种弥补吧。它或许并不那么耀眼,却自具与众不同的光泽。

引言

《文选》，这部编于公元 531 年（萧统卒年）以前的总集，从隋代中期开始，逐渐在一系列总集中脱颖而出。一群当时最为渊博的学者，和那些注定会在广袤的时空留下痕迹的文士，都将自己的无尽精力与才智倾注于它。乡学的教材、游子的行头、公主的礼品、外夷的经典，它最终得到与五经、三史平齐的地位，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记载于两《唐》书中的“《文选》学”，将它的滥觞期计算在内，可以包括曹宪学术的隋代时期，并溯及萧该和《文选》的早期流传；而作为曹、李“《文选》学”的嗣响，五臣注等一系列开元、天宝年间的《文选》著述，以及晚唐五代笔记中有关《文选》的评述，许多作品在文化与文学传播上的意义恐怕要大于学术本身。这样全面地讨论，作为一个学术个案的隋唐“《文选》学”，其时间跨度当有三百余年。虽然后来历代文人仍在讽诵《文选》，相关著述也不时出现，但是作为时代的一个精神焦点，《文选》的黄金时代就只能认定在隋唐。与之相比，宋、元、明的大部分《文选》讨论，不是流于细碎，就是失之肤薄；清代号称《选》学复兴，相关专著近 20 部，数量已超过隋唐，在校勘与训诂方面也颇有进展；但就总体而言，大多仍然是为李善、五臣注作笺疏而已。与乾嘉以来学者在经学新疏方面的重大进展相比，同时的《文选》著述在学术分量上仍稍嫌不足。以学术的原创性、开拓性与影响力来衡量，当仍以隋唐《文选》著述为胜。

学术界关于隋唐“《文选》学”的讨论，六十多年前骆鸿凯《文选学》里已经辟有专节，近年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和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也有相关篇幅。《文选学》的基本材料颇称详备，体例则近于概论而远于专题研究。孙书篇幅较少，屈著胜义

纷披,而在点的深入和面的铺开上,都还不能说略无余义。论文方面,饶宗颐先生有《唐代文选学略述》,发覆考证,颇多独到之处。

本文试图在前辈的基础上,以当代《文选》研究为基准,对隋唐“《文选》学”作出较为全面的论述。虽然非常期望所有结论都能有坚实的事实与文本考证基础,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也侧重于此。而史文阙略,文本浩繁,学力与时间的双重约束,使得文中的论述部分仍然只能做到部分比勘前提下的谨慎推断。在具体的版本运用上,除了敦煌写卷与日本所存古抄本《文选集注》外,李善注主要以直接承袭南宋尤袤刻本的清代胡克家刻本为主,五臣注则依据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代陈八郎刊本,细部论述中的版本对勘与疑问,往往随文注出。凡此皆在正文之前先作说明。

谏陋知愧,识者谅之。

目 录

序	骆玉明
引言	1
第一章 《文选》成书与历代《文选》研究	1
第一节 历代关于《文选》成书的讨论	1
第二节 民国以前《文选》研究的主要内容	16
第三节 《文选》研究在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26
第二章 早期的《文选》音义之学	36
第一节 梁、陈学人流动与《文选》的早期流传	36
第二节 萧该与《文选音义》	43
第三节 曹宪讲学江淮及其《文选》著述	50
第三章 李善生平与李善注的成书	59
第一节 李善的家世与仕宦经历	59
第二节 《文选》李善注的成书与文本变迁	69
第三节 李善之前的篇章注释	89
第四章 李善注的卓越成就	108
第一节 发凡起例,树立集部学术的范例	108
第二节 括囊旧注,集汉晋以来篇章注释的精华	116
第三节 释典:李善注对八代文章特点的把握方式	128
第四节 李善注的音义训诂学	137
第五节 李善注的校勘与考证	159
第六节 李善注的作家传与解题	175
第七节 李善注的知识与诠释世界	184

第五章 开元以后的“《文选》学”嗣响	217
第一节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的相关问题	217
第二节 《文选》五臣注的学术评估	225
第三节 五臣以后续、注《文选》的几次努力	238
第四节 《文选集注》略述	253
结语：传统的认定、诠释与接受	269
引用书目	279
附一：宋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	287
附二：几种《文选注》本中的音注比勘材料	303
后记	312

第一章 《文选》成书与历代《文选》研究

第一节 历代关于《文选》成书的讨论

在讨论隋唐“《文选》学”之前,需对《文选》的成书与历代《文选》研究有一个总体认识,以便为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平台,首先即是《文选》的成书。而古今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实有全面介绍的必要。

在清代以前,关于《文选》的记载与讨论都相当简略,如《梁书·昭明太子传》中即仅记书名、卷数:

《文选》三十卷。

后来书目所载大致相同。日僧空海唐时入中国,他在《文镜秘府论·集论》中说:

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错。

空海的说法肯定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因为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所附小注中,也有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人选集《文选》的记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则引唐人窦常之说,称“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

窦常的说法有些问题,因为何逊约卒于天监十六年,当时萧统才十六岁,《文选》的编撰肯定是后来的事情。同理,《玉海》中所

谓何逊参编《文选》的说法也不大可靠。《文镜秘府论》于《文选》的取舍颇有微词,宋代以来,这样的批评更延伸到文章分体。简短的如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讥斥萧统将屈原赋列名为“骚”体,“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①,又如清初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称:

昭明《文选》初成,闰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②,择之可谓精矣。然所录之文,不无伪制。^③

后来姚鼐也称“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④。

此类指责在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

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

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已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

① 《荆溪林下偶谈》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曹道衡先生认为出自宋吴械《韵补》:“《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曹说见俞绍初《〈文选〉成书过程拟测》一文的注释,此文收入《文选学新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曝书亭集》卷五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

汉武帝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

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旨,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

《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有“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

《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诂,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①

这样的说法不能说绝无道理。但是《文选》的分体并非完全是独出心裁。骆鸿凯《文选学》引《文心雕龙》、《文章缘起》、《匡谬正俗》等书,说明文体分类过细乃是当日时尚,“史述赞”之名也是承挚虞《文章流别集》而来②,即使可笑也不应完全归于《文选》编者。他将古来关于《文选》篇目取舍的议论分为六种:

① 《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 《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

入选之文有为贗品者；
 入选之文有事与人不足录者；
 入选之文道理、事理、文理俱无者；
 入选之文失于滑泽者；
 未选之文有宜取者；
 未选之文从而为之词者。

《文选学》中又称：

《文选》编次文辞，有增删者，有割裂者，有误析赋首或摘史辞为序者，至于标题、叙次之间，亦不无小失，此固无关宏旨，不足为其书病也。

这真是通达历史、护惜古人的恕论！唐宋以来对《文选》的议论，常会忽视《文选》本身为一历史产物的事实，不无察察小节、以偏概全的毛病。

不过，唐宋人的观点是否有误是一回事，至于实际影响则是另一回事了，譬如也为《文选学》所引的苏轼的有关批评：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卑陋，而萧统尤其卑弱。^①

这位身后进入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行列，为南宋以来文士理想人格范型之一的北宋文人接来说，按照他的标准，没有比萧统更不会写文章、见识更鄙陋的人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文选》中陶诗甚少、误把正文作序言以及所谓“苏李伪

① 《东坡题跋》卷二，《津逮秘书》第十二册，汲古阁本。

诗”等现象作为例证。相对于苏轼举例过程中的以偏概全~~嫌薄~~，他基于古文家以传道自期而轻薄齐梁的作法更能得到原谅。这样的立场既渗透了苏轼本人的创作经验和鉴赏视野，也带着鲜明的时代追求，当下影响力不应该被低估。南宋的张戒有所评论：

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汉魏晋奇丽之文尽存，所失虽多，所得不少。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①

张戒当然知道苏轼的分量，于是径直作退一步想，基本认同苏轼对萧统文才的鄙薄，承认《文选》选文定篇有失误，也默认齐梁文章卑弱的判断，但他通过强调《选》文“奇丽”及其作为诗赋“大法”的崇高地位，对受苏轼观点影响的士大夫提出批评。考虑到苏轼在南宋时的声名和影响力，这样的评论相当理智也相当有力。（接下来他还是忍不住将讥刺的矛头直接对准苏轼本人^②）可惜就《文选》选文标准的阐述来说，他和苏轼一样，显得笼统而缺乏说明。只是到了高扬骈文旗帜的清代阮元那里，才能看到更为详细的表达。

阮元的观点见于他的《研经室三集》卷二《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

① 《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同上：“子瞻文章从《战国策》、《陆宣公奏议》中来，长于议论而欠宏丽，故虽扬雄亦薄之。”

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同卷《文言说》详申“文”的内涵：

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

阮元借重儒家经典文字来张大骈偶文，贬低“古文”，貌似提升了《文选》的学术品位，却超出了《文选序》中揭橥的选文范围——“沈思”、“翰藻”与上下文结合起来才好把握，否则，后来信奉经古文学的章炳麟反击说：“沉思孰若庄周、荀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文学总略》）

民国以前关于《文选》成书的文字，大体皆甚简浅，更无深入的剖析，尚有待于近现代的《文选》研究。论近代以来对《文选》成书的考察，扼要言之，约以三端为重：一为编撰年代，二为《文选》的分类与选录标准，三为实际编撰人。三者本即联系密切，不同研究者常会轻重不等地连带言之。

最早较为全面的论述者当然是骆鸿凯，《文选学·纂集第一》溯总集起源，“最初选集列代之文以成一书者，当自晋杜预《善文》始”，“是诚《文选》之蕴蘊矣”；李充《翰林》“既录文辞，复标选旨，体例亦善，可为《文选》之先河矣”；挚虞《文章流别》“叙论各体，原流粲然”，分体选文皆与《文选》有相同处，“《选序》所陈之义，又与《流别论》大旨宛尔符合。则挚氏是书，真可为《文选》之前导矣”。骆氏又引《隋志》所录总集书目自谢混《文章流别本》以下十数种，认为：